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述要

姚 颖

[摘 要]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已成为历史,但这一工作并未终结,其成果为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学者所重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仍在继续这一努力。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与考据问题,应从其准备工作开始,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与历史考证版的编纂历程,兼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考据成果,从中探索有益于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考据

[作者简介] 姚颖,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哲学博士,北京 100032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8)01-0066-03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是不断完善的过程,不仅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出版著作逐渐面世,而且表现在对大量未定稿的编纂、考据及其相关研究产生诸多有价值的争议。争议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深入,同时呈现出解读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相关文本考据的研究同步展开,苏联、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及中国学者为此付出了诸多学术精力。其中,苏联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编纂与考据的工作至关重要,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影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容量、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历史考证版编纂的开启及其影响首屈一指。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苏联模式”,至今仍为各国学者所借鉴。

一、苏联马恩文本编纂与考据的起点与特征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工作开始于“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应该“由我们来收集”,从此开始有组织的收集、整理和出版。1921年成立的苏维埃俄罗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及其前身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0)实乃当时唯一收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学术实验室和国际中心”。该研究院先后编辑完成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朝鲜文版等文种所依据的版本;先后两次开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纂工作;其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同时用俄文

和德文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年鉴》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发表的文本;培育了众多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手稿、笔记展开了缜密研究,相关研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1931年,该研究院与1923年组建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不久又获得众所周知的名称:“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КПСС)。

应该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工作是国家级的系统工程,列宁生前对该工作寄予厚望,他认识到这种编纂与考据所具有的正本清源的意义,在投入财力人力等方面高瞻远瞩。首任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当时“已经磨炼出独特的工作方法,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后来几乎带有传奇色彩的收藏图书和管理图书的激情”,不愧为“收集资料的能手”^[1]。他与同事多次到欧洲收集并得到1/3的马克思手稿原件,影印了最全面的马克思文本复制件,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诸多重要文本的出版权,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笔记及其相关文献,“每一份档案、每一个书信原件或每一个拷贝,都不是一束束、一捆捆,而是逐个单独处理的”^[2]。他们的考证缜密而细致,在文本历次出版时间、译本以及版本的成熟度方面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对很多文本的考证体现出明显的持久性和生命力。

从整体来看,苏联马克思学以马克思著作的版本研究见长,“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以‘解读’见长,

研究者思想比较活跃,擅于提出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但版本考证工夫明显不及其前者^{[3] (P2)}。无论是加以肯定性借鉴还是加以批判性扬弃,各国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专家都难以绕开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版本研究的已有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历史考证版及其相关工作都不能无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版本。

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必须重视东西方两方面研究成果,重点在于较为系统地梳理相关历史资料,全面考量以往的研究实际,归纳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文本考据的合理结论及其整体成就,附以其他结论加以比较说明。面对极为庞杂的研究资料,完整地加以分类和归纳并非易事,苏联学者并未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作出系统说明。同时,苏联社会发展不同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重视程度也颇不一致。应该说,列宁时期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投入的工作最多,这段时间的资料尽管庞杂,但不难形成系统思路;受到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影响之后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则比较难于梳理,因为很多研究蕴涵在其他研究之中,如果绕开此类研究而呈现苏联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也未尽客观;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偏重马克思早期哲学文本,以之论证“人道主义”,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提供哲学支持,但相关研究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加以全面考量。

二、苏联马恩文本编纂与考据的问题与争论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主要是受到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多考据工作得出的结论为当时的政策作诠释。广大苏联读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及其思想的理解也是通过教科书有限的引用而得以理解的。自德波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系统阐述的尝试到20世纪中叶后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作出阐释^[4],但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引用方面,几乎都乏善可陈。弗罗洛夫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主编的《哲学导论》也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引用,但由于偏重阐释“新的或现实的人道主义”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选择与解读也很难说是客观而全面的。此外,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选择与阐释采用“掐头去

尾,不要中间”的办法,即去除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所谓“不成熟”的文本和马克思晚年带有“学究气”的文本,避开马克思中年创作的经济学文本中蕴涵的哲学思维,“基本作法或许可以概括为四部曲:第一步是汇集马、恩、列、斯大量引语,第二步是从引语中归纳出哲学原理,第三步挑选若干实例证实这些原理,第四步是利用这些远离证实苏联模式与苏联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5] (P73)}。即使沿袭这种程式化的做法,在“第一步”的“引语”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

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以梳理苏联学者的研究与相关争论为主,穿插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及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扬长避短。后者的研究从局外着眼,对苏联当时的研究现状特别是很多文本编纂细节的了解不及苏联学者,但可以避开苏联教科书思维的干扰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前者的研究得“近水楼台”之便,但不同程度地受当时苏联僵化思维的影响,对很多问题作出“贴标签”式的分类。比如,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出版和研究的历史》(1969)一书曾多次肯定性地使用了“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的马克思学”等概念,但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学”是资产阶级的学术商品。然而很多批评缺乏足够的根据,很多论著的学术性很难得到高度认可,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专家的重视。

三、研究方法及相关启示

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问题,应以文献学为基本方法。以梳理其研究文本的历史原貌为主体工作,通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2版与历史考证1、2版的版本概况、各分卷出版时间、语种,梳理苏联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排情况的书刊内容,理清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刊对马克思恩格斯未定稿的发表状况。在此基础上把握苏联编纂各版本的内容差别,阐述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为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情况及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历史发展与经验教训等。采用现代文献学研究手段,依据影视、光盘、因特网等提供的数据说明问题。

有助于推进该问题探究的还有客观解读的方法。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解释而言,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考据早期与中期更重视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即通盘考量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而不重视对个别词句的着意发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考据晚期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实乃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之后尘。

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看,还应倡导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秉持这种方法,才能从根本上生发文献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活力。具体说来,既关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历史,又关注“苏联模式”的内在逻辑。在考证苏联学者研究思路与成果的同时,力图分析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其文本考据的内在关联,“从前苏联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情况看,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是那些对文本写作过程的甄别、版本的考证、结构内容的分析等等,而不是那些对其现实意义的挖掘”^{[6] (P257)}。诸如此类问题的逻辑成因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分析和判断。

此外,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排与考据问题,从西方马克思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评性论说中也可以提炼出有益的内容。较之很多肯定性意见的复述而言,这些批评提供了研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部分线索与思路,很多理解可谓别具一格。应该说,西方马克思学家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前者注重探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认为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曲解、更改了马克思思想的本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更多的源于恩格斯的思想而非马克思;后者则注重从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一致性出发,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作为思想整体来看待。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理解未必没有过度解读的问题,但这种过度解读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毋庸置疑,MEGA2是对梁赞诺夫主持编纂的MEGA1的超越,这次耗时漫长、速度缓慢的编纂伴随着对“苏联模式”的自觉纠偏。即使这样,日本马克思学者仍然对此提出颇多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开始自觉地译介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50卷更是在翻译和编辑俄文2版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等科研院所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编纂与考据投入了

大量精力,译介了相关研究著作,很多学者尝试进行颇具原创性的文本考据与经典文献的“重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外国哲学资料》等丛刊辑录的文章有助于国内学者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了解。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在21世纪初掀起新的高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目前也在编纂过程中,该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重视与借鉴毋庸置疑,其他相关研究几乎无法绕开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历史性工作。

随着苏联历史的终结,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已经成为历史,但俄罗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专家的努力与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成果并未断裂。它不仅表现在拉宾、科兹明、乌达利佐夫等苏联学者的解读文本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而且表现在当时活跃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工作中的巴加图利亚等俄罗斯学者至今仍为MEGA2的编纂付出努力。更何况,热衷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世界各国学者仍然从“苏联模式”中解读出自己的研究心得,用以推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梳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历史,判断利弊得失,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达·梁赞诺夫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J]. 蒋仁祥,译.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20).
- [2] 福·席勒. 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J]. 社会主义运动史文库, 1930 (3).
- [3] 鲁克俭.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4] 安启念.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J]. 教学与研究, 2006 (11).
- [5] 王东. 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6] 聂锦芳. 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编辑说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胡彩芬]